



天外“求索”文库



ZAI GONGTONGTI YU SHEHUI ZHIJIAN
20 SHIJI 90 NIANDAI
ZHONGQI YILAI DE
XIANGCUN NVXING XINGXIANG

在共同体与社会之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
乡村女性形象

李彦文◎著

在共同体与社会之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
乡村女性形象

李彦文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共同体与社会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
乡村女性形象 / 李彦文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10

(天外“求索”文库)

ISBN 978-7-310-04650-8

I. ①在… II. ①李… III. ①乡村—女性—人物形象—
—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0466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270×155毫米 16开本 18.5印张 2插页 258千字

定价：36.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天外“求索”文库

天外“求索”文库编委会

主任：修刚

副主任：王铭玉

编委：余江 刘宏伟

序

乔以钢

新著《在共同体与社会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乡村女性形象》，是李彦文博士最近三年多勤勉耕耘的学术收获。

李彦文博士2010年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她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和学术训练，打下了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还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她已经开始关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当代作家笔下的“英雄-美人”、“拟母子关系”等人物关系模式的解读中，得出了颇有新意而又令人信服的结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进一步钻研了叙事学、文学社会学，并较多地涉猎了女性主义、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相关理论。她的博士论文熟练而恰当地借鉴和运用叙事学、文化研究以及历史哲学等理论方法，对研究对象做出了很好的阐释，显示了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

彦文是好学的，她不仅常与我探讨学术问题，而且还抓住一切可能的学习机会，充分利用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两年时间，从各位老师那里汲取学术营养。据我所知，她经常去听李新宇教授、耿传明教授的课，常常和老师们交流；她积极参加文学院举办的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专注听讲，认真记录，用心思考，主动提问；她还经常与博士生同学一起探讨学问，时常为此废寝忘食。

彦文对治学的严肃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为了确定博士后出站报告选题，她曾长时间泡在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种文学期刊，阅读初版的文学作品，观看相关

影视剧，做了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良好的学术素养，扎实的准备工作，使她的研究能够从一开始就避免单纯从理论出发凌空高蹈的学术姿态。她的选题来自踏踏实实的潜心阅读和敏锐发现。

从学理上说，乡村女性形象这一选题并不是多么新奇、时髦，它不像都市女性形象，尤其是所谓美女写作中的年轻都市女性形象那样吸引眼球。然而，恰如有学者指出的，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要是乡土文学。作为乡土文学中主要形象之一的乡村女性形象无疑与这一文学现实紧密相关。可是，就乡土文学的研究状况而言，通常比较重视的是创作主题，比如现代性带来的翻天覆地之“山乡巨变”，或细小之处的“死水微澜”；而针对农民形象的研究，则往往是将男性人物作为农民的代表。这大概与乡土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男性，他们对乡村女性多有隔膜、不够熟悉有关。但无论如何，乡土文学研究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分析不够重视是一个缺憾。当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对乡村女性形象的考察，但往往侧重其性格特征、道德内涵，一些研究者对女性形象的评价又常与文本叙事者对人物的看法高度一致，缺乏必要的批评距离和独立的立场。

正是由于相关研究存在不足，使彦文探讨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勘察乡村女性形象意义独具。作为一位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的青年学人，彦文将自己的考察范围设定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时段。这样的设定并非随意择取，而是得自她在阅读中的感受和发现。通过大量阅读，彦文敏锐地注意到乡村女性形象在90年代初相对“退场”，又于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以后“再度出场”并有着复杂呈现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与作家的视点下移、“底层写作”的兴起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一选题是有挑战性的。这不仅因为其所追踪的是尚未历史化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实，而且意味着它需要研究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富于深度的思考。

我们知道，女性形象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关注的重要部分。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研究了笛福、约瑟夫·康拉德、托马斯·哈代等五位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美国的凯特·米利特曾

就亨利·米勒、诺曼·梅勒、让·热内笔下的女性形象展开论述。她们通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尖锐揭露了西方著名男性作家书写女性形象时潜藏着的男性中心意识。米利特还在理论层面提出了“性政治”概念。她将“权力”概念引入性别领域，犀利地指出，自古及今“两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支配和服从的关系”，而且这一权力关系具有普适性，“它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形象研究中，一些学者深受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致力于揭露本土作家创作中的男权意识。这些研究在富于文化冲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争议。

毫无疑问，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培育了根基深厚的传统性别观念。中国现当代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的创作，往往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定的男权意识。对这一落后的性别观念进行批判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在于，一段时间里，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这种批判似乎某种程度上近乎陷入了模式化操作。在这样的操作中，无论是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还是苏童、李佩甫、毕飞宇，研究者对不同时代的男性作家文本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在思路方法以及结论上很少差别。这恐怕与批评实践者对米利特“性政治”概念的全盘接受不无关系。而事实上，米利特的“性政治”概念在颇富启发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将“性政治”本质化、真理化的问题，即忽略文化传统、民族、阶级和地域等方面的重要差异，简单认定男女之间存在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

迈入 21 世纪前后，性别视角在国内学界受到重视。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以一种“涵盖的视野”考虑两性复杂的经验。他们认识到这种经验是在社会性别与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年龄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从而有意识地力求避免在性别问题的讨论中陷于狭隘和偏执。这种研究思路不再拘泥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① [美]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3 页。

而是广泛借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克服因视角局限产生的视域盲点，为我们更好地呈现和分析本土性别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彦文的这部专著所遵循的也正是“涵盖的视野”这一研究思路。她没有止于探讨文学创作中乡村女性形象的性别文化内涵，而是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女性形象的“再次出场”问题化。既注意到当代文学内部这一时段乡村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将其视为不同性别、年龄和出生地的作家通过书写行为与当下社会转型的现实进行对话的努力。这样，便有可能把这一文学现象放回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中，放回到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在多个层面上共时性的交叠混杂这一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将它看作是不同立场的文化力量在乡村女性形象这一文化场域中的较量。

在具体研究中，这部著作从横向上将乡村女性形象与此一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社会思潮建立起必要的联系，同时注意到城乡差别、阶层分化带来的乡土文学、底层文学与城市文学在书写乡村女性时的立场差异；在纵向上，作者将自己阐释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乡村女性形象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乡村女性形象塑造传统中加以考量，这样既可辨析被承续或改变的传统是否能与当下现实进行有效对话，又可避免分时段研究容易出现的孤立与断裂。这样的努力，使书中的分析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比如在分析乡村女性形象形塑中的“风景化”、“道德化”取向时，该书注意到这一取向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剖析现代文学中“出走”这一叙事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演变时，不仅注意到此时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五四”文学中的启蒙现代性与个人主义诉求，同时也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对市场经济与文化资本的倚重，以及中国社会悄然兴起的个体化进程等因素对这一叙事改变的参与。相关论述结合作品实际，是有说服力的。这显然是作者深入思考的结果。

此外，书中借鉴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对城市文学在形塑乡村

女性形象时的外在性、任意性与卑贱的“他者”的论述，以及对乡土文学、底层写作以内在性为基础的对乡村女性的疼痛经验与异乡人经验的呈现及其意义的论述，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应该说，该书对“涵盖的视野”这一研究思路的把握是比较成功的，并没有因为复杂而显得芜杂混乱，而可以称之为思路清晰。其中，彦文对现代文学中乡村女性形象的书写传统的梳理尤其条理分明。而她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乡村女性形象研究的现实意义，则在于考察不同文化力量对乡村女性形象的不同意义建构，既可以辨析转型期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诉求的复杂向度与路径，同时也具有为被各种意识形态覆盖的乡村女性形象去蔽的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彦文综合借鉴社会性别、后殖民、属下研究、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资源，以文学的文本细读方法为基础，同时参照社会学研究成果与资料，适当采用症状阅读与文史互证的方法，既保持了文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也适当地向文化研究方向拓展，从而有利于所论问题的深化。

作为李彦文博士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很高兴看到她今天的收获。以往，我曾见证她学术研究上努力进取的志气和勇气。多年以前，彦文就曾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后记中引用著名作家张承志的句子：“正好前驱，不须反顾。”我想，这大概可以视为她执着追求的写照。当然，学术研究在她不仅是艰难的，同时又是快乐的。每次见面，她的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那温和里透露的是自信和愉悦。

彦文博士后出站以后，进入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任教，工作格外忙碌。但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她一直在抽时间充实、修改自己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现在，终于可以为前一阶段的研究交出一份成果。我相信，已经具备良好基础的彦文，一定会在学术研究的路上坚定前行，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衷心期待着。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乡村与乡村女性	19
第一节 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乡村	19
第二节 乡村女性	31
第二章 “风景”、共同体与永恒女性：延续与危机	48
第一节 民族文化认同与现代文学想象“地方”的方法	48
第二节 “风景”中心的少女与共同体之善：盾与矛	62
第三节 后寻根之痛与贞孝之女的幽魂	81
第三章 “老乡村”、父权制、市场与个人的走出	101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言说与想象“老乡村”的方法	101
第二节 差异政治、父权制与个人的“走出”	122
第三节 个人、教育与市场	140
第四章 乡村女性在城市	154
第一节 城市小说/文化中的乡村进城女性形象	154
第二节 乡土文学中的乡村进城女性形象	172
第三节 个体自主筹划的人生	191
第五章 当她们开始书写乡村女性	210
第一节 反叛与接续	211
第二节 乡村女性的爱欲与身体书写	238
第三节 历史叙事：寻找我们母亲的田园	254

结 语·····	272
参考文献·····	274
后 记·····	282

导 论

0.1 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所论述的乡村女性形象，指的是当代作家关于居住并生活于乡村的女性以及虽后来居住于城市但出生于乡村的女性的想象。这里，“乡村女性”首先是一个身份概念。因为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出生于乡村不仅仅是一个出生地的问题，更是一个身份问题。国家的户籍制度规定的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把中国人分为农业户口的农民与非农业户口的工人两大阶级，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结果是使农业户口的乡村女性成为与乡村男性一样的“二等公民”。其次，“乡村女性”还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即女性与其生存空间（乡村与城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因为乡村女性的地位与机会的获得，是由特定社会空间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

本书选取的研究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这是因为就本书的研究对象——乡村女性形象而言，有一个从 20 世纪的连续出场到 90 年代的退场再到 90 年代中期以来再次出场的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乡村女性形象一直是居于主流的女性形象，从“五四”时期开始，祥林嫂、春宝娘、郭素娥、翠翠、阿黑、白毛女、小芹、改霞、小月、马樱花、小水、戴凤莲等都是各时代的著名女性形象。然而，到了 90 年代，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著名女性形象却是一批城市女性：王琦瑶、尹小跳、来双扬、白大省等。似乎是，城市女性形象终于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进军，而乡村女性形象却从中心位移到了边缘。无论是从数量与得到的批评家的重视程度看，乡村女性形象都是近乎缺场的。90 年代中期，当代文学出现

了所谓的“视点下移”现象。作家把目光再次投向民间和底层，乡村与乡村女性形象得以再次登场。但是，乡村女性形象的这一次出场，并未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占据中心位置，即她们的再次出场并不构成城市女性形象的退场，而是与城市女性形象一起成为新世纪当代文学场分化的表征和见证。

与20世纪乡村女性形象相比，这一时段的乡村女性形象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既可以看到类似于20世纪初启蒙现代性视角下的处于弱势的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乡村妇女形象，也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审美现代性视角下兼具纯真与自然之美的少女形象；既可以看到如同从《孝经》中走出的堪称典范的贞孝之女，也可以看到已经具备相当的现代观念的新女性；既可以看到阶级叙述传统中被动、无助的乡村女性，也可以看到奋斗个体式的颇具主动性的乡村女性。可以说，此一时段乡村女性形象的驳杂景观，使她们表现出了“不同时代性”的特征。

0.2 已有研究综述

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时段乡村女性形象的研究仍显不足，除了几篇硕士论文外，其他仅限于针对单个作家或单个作家的单部或单篇作品的研究论文。

国内女性主义研究对此一时段的乡村女性形象有所涉及，通常所采取的路径是：（1）、从肯定女性写作的角度阐释女性作家塑造的乡村女性形象。比如黄柏刚的《女性文学回归现实的新变信号——评方方新作〈奔跑的火光〉》^①认为小说重点展示了英芝“杀夫前屈辱悲惨的生活和压抑痛苦的心理，塑造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叛逆型女性人物的新形象”。张楠《乡村文明·都市文明·姐妹情谊——读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②、吴妍妍《无望的“姐妹情谊”

^① 黄柏刚：《女性文学回归现实的新变信号——评方方新作〈奔跑的火光〉》，《当代文坛》2002年第3期。

^② 张楠：《乡村文明·都市文明·姐妹情谊——读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

——读〈歌马山庄的两个女人〉》^①、何向阳《歌马山庄里的“姐妹情谊”》^②均从姐妹情谊的角度分析孙惠芬的《歌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这种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只关注那些具有鲜明女性主义特征的文本，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更重要的文本。（2）从男权制批判的角度阐释单个男性作家的创作，或对单个男性作家的男权意识进行批判。前者如宗元《无望的挣扎·人性的扭曲——论毕飞宇近作中的女性世界》^③、李生滨《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④、王向东《父权阴影下的女性之痛——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论》^⑤等，均从压抑与扭曲女性之人性的角度批判父权制。后者如翁菊芳《论毕飞宇小说男性主体精神》的系列文章^⑥以及李娟、马臣《男性的“圣母”想象——论李佩甫小说〈城的灯〉女性叙事的谬误》^⑦，分别对毕飞宇、李佩甫的男权意识进行批判。但是，由于所依据的理论大致相同，这些文章对不同作家的批评实际上并无多大差别。总之，此类研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局限性明显。

乡土文学研究往往偏重于乡土文学主题与农民形象研究，即使有对乡村女性形象的研究，也多是侧重其性格与道德品质。比如孟繁华认为《秦腔》中的白雪是“清风街东方文化最后的女神：她漂亮、贤惠、忍辱负重又善解人意”^⑧；管笑笑认为《蛙》中的陈眉

① 吴妍妍：《无望的“姐妹情谊”——读〈歌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语文学刊》2006年第6期。

② 何向阳：《歌马山庄里的“姐妹情谊”》，《名作欣赏》2008年第9期。

③ 宗元：《无望的挣扎·人性的扭曲——论毕飞宇近作中的女性世界》，《小说评论》2002年第4期。

④ 李生滨：《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

⑤ 王向东：《父权阴影下的女性之痛——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⑥ 翁菊芳：《论毕飞宇小说男性主体精神》，《科技信息》（学术研究版）2008年第20、21、27期。

⑦ 李娟、马臣：《男性的“圣母”想象——论李佩甫小说〈城的灯〉女性叙事的谬误》，《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⑧ 孟繁华：《风雨飘摇的乡土中国——近年来长篇小说中的乡土中国》，《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是“《蛙》中最纯洁无辜却饱受重重苦难的人物。她性情中的高贵、贞洁、孝顺和母性象征着民间伦理中最坚实和美好的部分”^①；薛红云《〈刺猬歌〉中的“大地女儿”形象》^②赞美张炜《浪漫与丑行》中刘蜜蜡地母般的奉献与拯救，批评《刺猬歌》中的“大地女儿”美蒂受到金钱的诱惑背叛了廖麦；刘保亮《论阎连科“耙耧小说”中的河洛女性形象》^③指出阎连科塑造了贤妻良母式的乡村女性形象，并褒扬她们无私奉献的美德；张月阳《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硕士论文）^④亦复如此。这种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与文本对人物的评价经常保持高度一致，缺乏必要的批评距离。

底层文学研究重视揭示文本对底层苦难与话语权的表现。比如李雪梅《胡学文小说的底层女性世界》^⑤认为“苦难与向善，是胡学文小说创作的本质”，其中的底层女性们“尽管势单力薄、孤独无助，依然倔强地向善向上，渴望着属于自己的单纯理想，单纯追寻的背后是无尽的付出与抗争”。施战军《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林白〈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⑥、王琳《〈妇女闲聊录〉——溢出小说边界的后现代文本》^⑦均认为《妇女闲聊录》的意义在于让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看到，这一视角往往将乡村女性归入无性别的底层视域之中。

其间，有这样一些价值较高的研究文章：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⑧

① 管笑笑：《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论莫言〈蛙〉》，《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② 薛红云：《〈刺猬歌〉中的“大地女儿”形象》，《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

③ 刘保亮：《论阎连科“耙耧小说”中的河洛女性形象》，《洛阳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④ 张月阳：《论刘庆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⑤ 李雪梅：《胡学文小说的底层女性世界》，《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⑥ 施战军：《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林白〈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⑦ 王琳：《〈妇女闲聊录〉——溢出小说边界的后现代文本》，《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⑧ 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个人主义如今已经走向其反面, 获得了“个人意识”的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乡村女性“个人”, 只能孤零零地面对“市场”, 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因而并未获得“解放”。蒋军《又见“香雪”——一种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考察》(硕士论文)^①将新世纪乡村女性形象的原型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哦, 香雪》, 认为这一文本中的现代化追求的裂隙, 在新世纪小说中的乡村女性身上已经越来越大。两篇文章的知识考古学研究方式富有启发性。荒林《〈妇女闲聊录〉的史意》^②将林白《妇女闲聊录》看作其“个人化”写作的继续和深化, 参照公共写作阐释其意义, 认为它“是‘妇女’, 又是‘闲聊’, 使用‘录’而不用‘史’, 因为‘录’也是个人行为, 史却要公共认可。且‘录’应该是双方合作的行为, 这就使得《妇女闲聊录》更有女性主义的对话与交流风格了”。将论述深入到文体的女性特征方面, 很有说服力。

0.3 研究思路、方法与概念

本书借鉴“出场学”的研究思路, 尝试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女性形象的“再次出场”与此一时段的社会文化现实建立联系。

“出场学”作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关注的是“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的辩证关系”, 其核心范畴是“出场”与“差异”。其中, “‘出场’一词源自舞台表演艺术。在哲学阐释的语义分析中, ‘出’是摆脱被遮蔽状态而‘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中的行动; ‘场’也不是一个通常剧院的台场, 而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出场’也因此而成为人类亲临历史舞台的现身行动。人类既是历史的‘剧作者’, 又是‘剧中人’。由何种思想与主体(‘出场者’)扮演主角在特定历史场域中出场, 一直成为‘创造历史’的关键。”而“差异”则是打破同一的现存结

^① 蒋军:《又见“香雪”——一种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

^② 荒林:《〈妇女闲聊录〉的史意》, 《文学自由谈》2005 年第 6 期。

构而造成的特性。打破在场的同一镜像，彼此之间产生不同，或者是场域的差别，或者是出场者的差别，或者是出场语境、路径和形态的差别。“出场”与“差异”的关联在于，每一次出场，都是内在遭遇时空变换，从而使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都相应发生变化，产生差异。^①

“出场学”对本论题的启示意义在于：首先，不是将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乡村女性形象的“再次出场”看作自明的，而是看作一个同时包含着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的问题。因为，如同“出场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一样，乡村女性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出场、退场、再次出场的过程。换言之，“再次出场”这一语词已经包含了自身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域，它暗示了之前的曾经出场与退场的阶段。

从 20 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角度看，20 世纪乡村女性形象的持续出场，一如乡土文学一样，与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导密切相关，丁帆把它表述为“农业经济文化社会结构”^②，但这并不是说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没有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成分。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现代性都在挤压中国固有的农业文明并推动中国社会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转型，不过，中国农业文明的根基被彻底动摇，要等到 20 世纪 90 年代。此时，乡土文学开始边缘化，乡村女性形象也退场了。如果把视线投向这一时段的改革，则不仅 1985 年后改革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十四大（1992 年）更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后现代的消费主义话语逐渐占据主流。因而，当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已经在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之时，只有那些时尚的、消费性的城市女性形象，才是时代所青睐的。

1996 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给乡村带来的后果开始被学界普遍注意，虽然学者们给出的解决思路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认可“三农”问题这一提法。并且，“三农”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热点。

^① 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两个循环》，《学术月刊》2008 年第 9 期。

^② 丁帆的说法参见程光炜、丁帆、李锐等：《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纪要》，《渤海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